

城里的地老天荒

□ 王方晨



济南宽厚里夜景。

常虹摄

我的生活，有一个意义重大的词语，那就是“城里”。从很年轻的时候，我就做了城里的“闲人”。

之前在庄子里，年纪虽小，也要进行艰苦的“农业生产”。后来离了庄，成为一名中专学生，跟“农业生产”无关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要当一辈子“孩子王”。

曾经最羡慕的“城里人”，最大特征就是不用在庄稼地里出力干活。“城里”最可恶的一类人，在我们那里，被称作“街猾子”，基本上等于“闲人”。

当“孩子王”一点不清闲，没白没黑。因为写作，我只当了两年“孩子王”，就远去他乡，并于两年后开始了悠游自在的“职业作家”生涯——起码从形式上看，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清闲的工作了。

说得好听，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。在心里，我却暗自认为自己是被“白养”着。有人在为生计奔忙不休，我却能够每天坐在家，常常无所用心，隔三岔五才跟单位的人见上一面。当然，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安排，我都会去市、区、县许多部门和现场采访、学习，所以跟社会也不算太隔膜，也能借机看到不少别人不可能看到的东 西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似乎比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，更像一个“城里人”，因为这二三十年来，我总是有闲的。

在我的乡土作品中，我曾写过农民对不事稼穡的城里“街猾子”的敌视。那并非出于虚构，而是一种现实。城里人是什么样子，我已是知道

了的。由我去写乡土小说，自然可以有两种目光，庄稼人的和城里人的。既然我是个很像城里人的有闲作家，我在写乡土题材的同时，写写城里人也并没有什么出奇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对农村的记忆倒是日渐稀薄了。毕竟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，还得剔除不大记事的幼儿时期。

当年我看县城，那是不得了。我的庄子，踞于县城南八里，人唤“城南八里王庄”。县城叫“金乡”，而我长期不知道金乡更多的历史，即便现在，也所知有限。金乡最突出的标志，是城中一古塔。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见到的这座塔，但不会太早。在我印象中，县城东关就很遥远了。看一眼东关的码头，是我到现在还没实现的愿望。

从王庄到县城的距离，差不多就是从现实到未知的距离。每每赶集上会，都会揣着一颗又好奇又胆怯的心，好像随时都会踩上陷阱，随时都会被城里人欺负。后来因为考上师范学校，我在曲阜县城生活、学习了三年，而且有机会抵达了省会济南。那时候，我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这座北方城市产生更密切的联系。

不用说，跟济南相比，县城小得多了。

师校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金乡县城。才过两年，就又离开故土，前往青岛求学。在青岛大学只停留了一个月，就因故退学回来，见了父母和单位的人，并不道出实情，随后去了另一个县城，熬过元旦，才把学生关系转到当时的济南师专。事实证明，我

从青岛大学退学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在济南的学习，使我有机会调到鲁东北一地的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学创作，一口气将这闲差做了十九年。然后我来济南当编辑，还是做文学，而且很可能做到老。

不管我身上残余了多少农民的习气，我都认为自己最像城里人，因为我是世上少有的并且生活在城市里的“大闲人”。

为什么我几十年来呕心沥血，不停赋诗作文，还要认为自己“尸位素餐”呢？因为我是在依从一些普通人或者是老农民的观念来评价自己，甚至我自己也一直秉持着老农民的观念。我不生产吃的、喝的，穿的、用的，就是说，除了物质，其他一切都是虚的，都是在“玩”。

你看，以不同的观念看世界，世界就会有不同的面目。我也乐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多么高级，以便踏踏实实做一个城里的闲人。

自然，城市生活给我提供了书写城市的物质条件。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，对于城市不可能是陌生的。我写济南，也并非突然。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与济南邂逅，经历了在济南求学的时光，其后也不断地与济南发生联系，到我调至济南工作，济南差不多横跨了我所有在城市生活的时间。

而实际上，别说那些比我迁居济南更早的人，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济南人，甚至祖辈几代都是本地土著的老济南，都随处可见。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短，并不决定一个作家能否真正写出这个地方的神韵。

正像我写乡村会有两种目光，我写城市，写济南，也应如是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不论写城市，还是写乡村，我很注意的就是自己会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所要描述的对象。

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，而一个作家必须具有突破局限的能力。

很多时候，生活就是一个泥潭。作家既要善于从这泥潭般的生活中发现真善美，也要善于挑毛病。我一直都在挑庄稼人的毛病，但要是说忘本，我不同意。同样，我也会挑城里人的毛病。我很闲，但很闲也不吟风弄月。

亲眼目睹一批批文学路上的同行者渐渐偃旗息鼓，或终于归于平庸，在我看来，就是在泥潭中浸淫太久的缘故。文学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消

耗，而应该给予我们一种从泥潭中拔出腿来，甚或腾空跳起的力量。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眼前这一点事情，文学一定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眼界。

在写作中，我给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找位置，也是在给我所要书写的乡村、城市找位置。这是一个用文字营构的世界，要见得到天，也要见得到地。小说里有句话：“这样的一幕，幽暗，质朴，却似乎透出一种悠长的光芒，可以照彻老实街的往昔、今生和来世。”我们所描述的对象，不仅要有空间的位置，社会关系之中的位置，还应该有时间的位置。“阴阳割昏晓”。在作品中，时空的表现之外，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。

我居住在济南。济南是一座传统色彩浓厚的城市。既然要写济南，怎样看待这座老城是很大的问题。一个城市有很多面，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。从内看与外看相比，还有更大分别。

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，但是，从落笔起，我就意识到，不管我写到多少的器物、手工艺、老词、老理，这条老街巷都不能仅是济南的老街巷，那些执迷于老词、老理的老济南人，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，既属于生者，也属于死者。我以我的钝笔，勇敢地在这些小说中试图去做打通古今幽明的豪举，因为我知道，做了大半辈子的“城里闲人”，是要为“城里”说出点什么的，而这深思熟虑之后的创作，于老之将至的我又是特别重要。

这条老街巷，被我命名为“老实街”，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，却完全出于我的虚构。在小说一些章节陆续发表期间，不断有人问我，济南有没有老实街？我说没有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大姐说，怎么没有？济南就有一条道德街！“老实”和“道德”，二者就这样对上了，真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。

但济南有条宽厚里我却是知道并亲自去访探过的。“宽厚”也是我为这条老街巷命名的诱因。回头想，“道德”“老实”“宽厚”，恰好也正是组成济南文化的核心因素。

还有问济南有没有“涤心泉”的。济南有七十二名泉，不见经传者不计其数。

涤心泉洗的是心。老实街遍布着屋中泉、墙下泉，另有一虚构了名字的，唤为浮秤泉。“浮秤”二字自然出于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：“道不行，乘

◎在场

桑株时空

□ 丁祖荣



八月时节，相约桑株。

仿佛千年誓愿，在万山之祖的怀抱里。

这次非比以往。曾经袅袅青烟随风去，马嘶驴鸣人欢过。夜深了，在老乡沉雷似的鼾声里，拂昆仑山风，听桑株河水，亿万年不变地流过。这次，于我是最壮阔的相约和告别。

天还没亮，我从皮山固玛出发。皮尔曼的石榴花落了，沿着桑株河向深处岩画处寻去。桑株，一说是藏语，吉祥如意。也有说是维吾尔、藏、汉、柯尔克孜等各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发音演化而成。几千年前，先民们在岩石上刻画生产和生活。岩画裸露在外，牲畜走过，磨掉了不少符号。任其下去，历史的印迹可能毁于自然和畜力。我们援疆做了一个保护项目。我们出资，老乡们积极参与，为岩画做隔离保护。保护住了岩画，就保护了精神传承。

桑株岩画，在柯尔克孜居住区外。这个居住区是老乡们的搬迁移民项目，散居各地的老乡们通过国家和我们的援疆补助，再自筹一部分资金兴建的。老乡们冬天回到桑株岩画旁的居住区生活，春秋季节转场放羊。

我去年底曾来检查过，当时雪山在望。许是“7·3”大地震的消耗，可能是风沙相迫的窘境，可能是库尔浪之夜与老乡们聊脱贫、话真情太深，体力有些透支。到时，我仍昏睡在车里，有点不知所向。他们都说我的样子有点吓人，慌忙把我安顿在老乡的屋子里，一躺到地毯上，立刻又昏睡过去。

桑株岩画的图腾，羽化成

父亲的细叶芒

□ 马淑敏



父亲一生都在与草战斗。

父亲的这场战争漫长而持久，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和精神。与堂吉珂德同风车对抗相比，父亲更像一个强者，因为他拥有机车和锋利的铧犁，这些工具可以轻易将蓬勃的一望无际的草斩尽。但是，所谓的胜利不过是一年的事，无论用多么沉重的链轨碾压，用多么锋利的铧犁切割，次年，只要春风拂过，草儿便悄无声息地穿透结实的泥土一丛丛一蓬蓬生长起来，它们蓬勃有力无所顾忌，甚至用柔软的身躯铺满停放机车的场院，向链轨和铧犁示威。

春天的早晨，空气尚且凛冽，面对一夜间怒放在链轨缝隙间的一株红灿灿的野蒜花，父亲坐下来，燃起一支烟，静静地和它对视。我伸出的手被父亲按住，他说，让它再长一会儿吧。几分钟后那朵花儿别在我辫梢儿，父亲和他的机车隆隆奔回原野。是的，是原野。

为了彻底打败无边无际的野草，父亲在砍断野草的地方种上黄豆和玉米，他希望春风像呵护野草一样把黄豆和玉米撒得漫山遍野，荒山野岭都挂满粮食，那样，就没有人再挨饿。

父亲离开我的很多年里，闭上眼睛，常常看到父亲和他的机车驰骋在荒野，像一只蚂蚁，一口一口啃噬茂密的野草，每一口都艰辛无比。

每年春天，我们的家跟在父亲机车后面移动，父亲的战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我们的家，每一个新家的篱笆角落必定长出一蓬细叶芒，细叶芒很快填满篱笆缝隙，抢走母亲种下的南

瓜或者豆角的养分，直到南瓜和豆角枯萎。父亲不介意母亲的抱怨，带着我们在房子后面重新栽上一排豆角南瓜。父亲很坦然，吃终究是要吃的，草该养还是要养的。

父亲与草的战争持续了一生，他没有打败草，这是他引以为骄傲的。与我们理解的胜利不同，父亲说，原野是草的家园，人类是掠夺者。和堂吉珂德与风车的搏斗相比，父亲对野草更多的是怜惜，这低微的为生而死为死而生生生不息的野草，为他提供了一份切实的赖以生存的职业，在他活着时光中，除了机车，野草是贴紧父亲的最真切的生命。

细叶芒，是父亲家乡的草，一个跟野草博弈半生的人，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竟然还是野草。当然，不止野草，父亲念念不忘的故乡还有黄河吕剧、阿胶和曹植。

据说吕剧原本叫做驴剧，是人们骑在驴子身上吟唱的调调，只要两个人就能唱得如火如荼。后来驴剧变成两只口的吕剧，唱的人也从田间地头走进房舍剧场。吕剧浸泡着鲁西人，呼一口气便随着空气涌出来，父亲呼出的二氧化碳便是这样的味儿，无论什么歌曲从他嗓子里唱出来，不消20秒都是《李二嫂改嫁》。他说，家乡是长在骨头里的，肉能增增减减，谁的骨头能变呢？

故乡于父亲那一代是骨与髓，他们的故乡是无法移动的一方土地。故乡于我们这一代是父母的家，父母在哪儿，故乡就在哪儿。

我对父亲的故乡充满了好奇。若

干年后，走进父亲的故乡，太阳照在细长的胡同中，照在红色黄色的大门上，照在一张张被时间细细雕刻过的脸上，他们眉头的皱纹眼角的笑意如此熟悉，仿佛昨日我才离开。站在父亲无数次描述过的他来回进出过的胡同口，那些掀起过他帽子的风钻进我衣内，抚摸着冰凉森森的皮肤，我，突然泪雨滂沱，那一刻，“故乡”不再是两个汉字，她变得真实并有了切实的温度。

沿着父亲念念不忘的黄河堤坝行走，堤坝一侧，一株株高大的白杨树冠齐刷刷没过脚踝。顺着树冠望下去，柠檬色的河滩在缓缓移动，细细的沙随着风一缕一缕流动出层次分明的另一条黄色的河。挨着沙河的是黄河，是“九曲黄河万里沙，浪淘风簸自天涯”的黄河，蜜色河水翻卷着浓稠的浪花，我分明看到，浪花是被风掀起，又被风砸下去的，每一朵浪都被摔出沉重的质感，将脚下的泥土震得颤抖。

堤坝另一侧，一株株黄豆像我们一样挺直身子倾听着黄河，倾听狂风起浪的暴躁。尽管在奔腾不息的黄河旁生长，黄豆身体的水分照样被脚下的沙吸得干干净净，一颗颗豆粒在黄色的驱干中干瘪着，被风摇出铃儿般的响声，也被曹植死命攥住变成活命的诗。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”。在父亲故乡的土地上，弯弯腰捡起的曹植的诗，是仓颉的字……梵音和吕剧不过是才子们用来消遣的娱乐。看不清仓颉的字和曹植的诗是什么颜色，一味地认定，父亲的故乡只能是黄色，深深浅浅的黄，苦苦甜甜的黄，转眼就被夕阳裹挟着一道坠入黄河的金灿灿的黄。

秋风催果熟，石榴引燕回。

在夕阳将落未落的丰满中登上一座低矮的小山，鱼山，无人知晓为何叫做鱼山，只能揣测，也许是这段水路狭窄水缓鱼肥。鱼山上的石头虽不能与泰山石相比，整个院墙铺个院子却很顺手，几十年下来，鱼山村的猪圈院墙一茬接新，可怜鱼山只剩下一只鱼头。站在山顶眺望，前方是黄河入海的急切，远方是落日辉煌，遥想那年那一代才子曹植也曾望着夕阳用光线雕刻出的浪花儿沉思，一河黄沙一河诗，《洛神赋》在黄河滔滔奔

羊、鱼和人，演出千年大戏。那些穿越的场景排山倒海而来。克里雅河流至达里雅布依，湮尽在圆沙古城的废墟里。沿着昆仑的羊道，那一蹄蹄踏出的山水画卷缓缓展开。玉出昆仑不见玉，人没有了，只有肉身的附累。

米吉提大娘一直守在我身边，不停地吸泣，吸泣转化成民族团结之音，绵绵于昆仑山中，桑株时空。

醒来，有一种深深感动。走出屋子，廓大的天空和绵远的昆仑山，浓郁的精神氤氲。山中刚下过雨，被洗过的感觉。各色雪菊清新可人。这样的时空，人无一念。一群柯尔克孜小孩，穿着缤纷的衣裾，在草丛中飞来飞去。一张张红扑扑的脸，映在蓝天里，融化了我们的心。

离开时，相机跳跃在桑株河谷，人对物的投射，心与光影的纠缠，不断回应着昆仑山的召唤，这种生死时的时空是生命的伟力。我知道，援疆任务将要结束，我终将离去。桑株时空，一生牵挂。

（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）



▲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文艺部微信号“文艺菜园”